

方家讲坛

先生以西洋文化为西洋哲学之渊数，认为中国只输入民主与科学，而不同时输入作为民主与科学之本源的西洋哲学，乃是舍本而逐末。先生又以西洋哲学为中国哲学之「镜」，认为不了解中国哲学者，不在他们学了西洋哲学，而在他们虽学而未真懂。先生又欲融西洋各派哲学而构建中国新哲学，把中国近代哲学首次引入「创体系时代」，被誉为「新唯心论派」领袖……

西洋哲学

张东荪讲西洋哲学

東方出版社

方家讲坛

张东荪 著
张耀南 编

西洋哲学

张东荪讲西洋哲学

東方出版社

B5
70

目(CIP) 数据

张东荪讲西洋哲学 / 张东荪 著.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7.4

(“方家讲坛”系列丛书 / 恽哲 主编)

ISBN 978-7-5060-2756-4

I. 张… II. 张… III. 哲学史—西方国家 IV. B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41074 号

张东荪讲西洋哲学

ZHANGDONGSUN JIANG XIYANG ZHEXUE

著 者: 张东荪

编 者: 张耀南

责任编辑: 陆丽云

特约编辑: 陈丽杰

易彬彬

封扉设计: 奇文云海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6

印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版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张: 18.75 插页: 8

字数: 294 千字

ISBN 978-7-5060-2756-4

定价: 39.00 元

写在“方家讲坛”书系之前

论“大方之家”

张耀南

“方家”就是“治方术”的人，常以偏概全，故庄子称为“一曲之士”；“大方之家”是“治道术”的人，能超越一偏之见，故能得真理之全。“大方之家”与“方家”其实并不是一种家。

禅宗中有“盲人摸象”的公案：“其触牙者，即言象形如芦菰根；其触耳者，言象如箕；其触头者，言象如石；其触鼻者，言象如杵；其触脚者，言象如木臼；其触脊者，言象如床；其触腹者，言象如甕；其触尾者，言象如绳。”在这里，盲人就是“方家”，在一旁观战的不盲的国王就是“大方之家”。

“大方之家”知道“一”，但却不可守“一”，故有“大一”之视野；知道“阴”，却不固守“阴”，故有“大阴”之视野；知道“信”，却不固守“信”，故有“大信”之视野；……《庄子·徐无鬼》以这样的视野为最高境界：“知大一，知大阴，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方之家”就是通“大一”、解“大阴”、视“大目”、缘“大均”、体“大方”、稽“大信”、持“大定”的一批人。

这样的人现在还有没有？也许有，但已经不多了。在一个急功近利的时代，这样的人是产生不出来的。这样的人是一个慢节奏的社会，磨出来的。《老子》五千言，只相当时代的论文半篇，他要拿来评职称，恐怕连助教也当不上。可他却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影响人类二千余年呢！

我们在现时代，找不到《庄子·天下》那般的“大方之家”，找不到“天下”篇视为“方家”的老子、庄子这样的“大方之家”，我们可不可以找一些“现时代”的“大方之家”呢？当然是可以的。我们找到罗曼·罗兰，让他来讲音乐；我们找到弗洛伊德，让他来讲梦；我们找到李约瑟，让他来讲风水；我们找到沈从文，让他来讲服饰；我们找到梁启超，让他来讲佛；……这些凡人眼中的“大师”，虽不及一流的“大方之家”，但其视野，亦足以超越“一偏之见”，盖“方家”之帽有余矣。

于是我们就有这样的一套书，名“方家讲坛”系列，请“现时代”的“大方之家”讲建筑、讲古玩、讲唐诗、讲国学、讲科学、讲哲学……讲来讲去，“方家”或能出其“方”，凡人或能超其“凡”？

人类之于宇宙，俨若“盲人”；人类所得一切知识，俨然盲人摸象之所得。上帝不存在，没有推我们到“国王”的位置上去，一睹宇宙之真容。怎么办？只有一条路：听“大师”的话，跟“名家”走。就算“大师”、“名家”还不够“大方之家”之格，于我等“井底之蛙”、“凡夫俗子”，已足为“指路明灯”矣！

然则谁能不见笑于“大方之家”？答曰：无人能之！人之生此世，总免不了要“见笑”于他人的，只不要“大见笑”或“见大笑”，就够了！

二〇〇七年一月一日于北京

代序：
一九三〇年以前
中国人对西洋哲学的了解

张耀南

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有几个重要的关口。第一个关口是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此前输入的进化论以斯宾塞（H.Spencer，1820—1903）等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为主，以渐进论和决定论为主；此后（实际在1918年）柏格森（H.Bergson，1859—1941）经张东荪之手传入中国，“进化哲学”及其突变论与非决定论，开始登陆中国哲学界。第二个关口是一九二三年的“科玄论战”，此前是“科学主义”一统天下，以为科学是万能的，世间没有科学解决不了的问题；此后有以梁启超、张君勱、张东荪为代表的“玄学鬼”站出来说话，而开以“哲学主义”抵制“科学主义”之先河。第三个关口是“九一八事变”前后（笔者暂以“一九三〇年以前”代表之），此前是西洋哲学的平等输入，西洋哲学的各家各派平等以俱来；此后是西洋哲学的不平等输入，“唯物辩证法”或“辩证法唯物论”取得压倒优势的地位，其他西洋哲学几于“全军覆没”。这第三个关口带有决定性，它使“唯物辩证法”的优势地位不可逆转，使中国现代哲学的发展几乎没有了其他可能的方向。

一、为何以一九三〇年为界

我们选定一九三〇年为界，有很多重要的理由，其中一条就是上文所说的“第三个关口”的存在。这是就中国现代哲学的发展历程而言的。郭湛波撰《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1935.11）论及“中国五十年来思想的介绍”，认为中国自一九二七年“社会科学风起云涌，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因之“俄国的思想介绍盛极一时”^①。此处虽有“一九二七年”之说法，但“一日千里之势”却是肯定出现在一九三〇年以后。如贺麟的《当代中国哲学》（1945.5）一书，在论及“时代思潮的演变与批判”时，就说：“辩证法唯物论盛行于九一八前后十年左右，当时有希望的青年几乎都曾受此思潮的影响。”原因是什么？贺分析说，造成此种局面的原因，一是那时的中国学术界没有重要的典籍出版，二是那时的中国学术界没有伟大的哲学家出来领导青年。趁此空隙，从日本转译过来的“辩证法唯物论”之书籍，便充斥坊间，“占据着一般青年的思想了”。贺认为当时此种情形，不但中国如此，即“欧美先进国家亦如此”^②。当时“欧美先进国家”的思潮，政治上就是以极端民族主义和极权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法西斯主义”，哲学上就是以极端决定论和极端斗争论为主要内容的“唯物辩证法”。这两股思潮——法西斯主义与唯物辩证法——在当时是互为表里的。这两股思潮登陆中国并取得绝对优势地位，就是在“九一八前后十年左右”，我们细定为“一九三〇年”以后。中国现代哲学的发展受此冲击而发生转向，张东荪也把工作重点转到“检讨”唯物辩证法之上，故以“一九三〇年以前张东荪对西洋哲学的引介与探讨”为题，讨论西洋哲学的输入中国，有极重要的学术上及学理上的理由。这是就国内的情形而言的。

就国外的情形而言，一九三〇年前后也是“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

^①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页384，北平：人文书店，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初版，民国二十五年八月再版。

^② 贺麟《当代中国哲学》页72—73，台北：宗青图书出版公司，1978年12月初版。

关键时期。据江天骥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所撰“现代西方哲学 (contemporary western philosophy)”条，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和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19 世纪 40 年代至 19 世纪末为第一期，出现了唯意志论、生命哲学、实证主义、马赫主义、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等哲学流派，影响到 20 世纪西方哲学的发展；19 世纪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第二期，出现了新实在论、实用主义、人格主义，逻辑原子论、逻辑实证论、现象学、存在主义等哲学流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第三期，主要流行存在主义、新托马斯主义、结构主义、现象学、解释学等哲学流派^①。“九一八事变”被史家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之一，可知一九三〇年正处于现代西方哲学从早期向中期过渡的关节点上。在这个关节点上，新实在论已经形成（形成于 20 世纪初），批判实在论正流行于美国（流行于 20 世纪 30—40 年代），实用主义正主导美国哲学界（在 20 世纪上半叶居主导地位），逻辑实证论正形成于欧美（形成于 20 世纪 20—30 年代），人格主义正在美国流行（与实用主义的流行差不多同步），现象学开始占领德国甚至整个欧陆的哲学界（在 20 世纪头 30 年流行），……可说这是前一时期的“结果期”，又是后一时期的“孕育期”，具有很浓的“承先启后”、“承上启下”的意味。故我们选择以一九三〇年为界，也刚好可以照顾到“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脉络。论述张东荪对西洋哲学的引介与探讨，照顾这个发展脉络是很有必要的。

除了上述国内、国际的背景，我们以一九三〇年为界限，还有一个“私人的”理由，那就是张东荪出上海私立光华大学、入北平燕京大学，刚好就是在这一年。这虽然只是一个“私人的”事件，但这件事无疑已影响到张东荪的生活与思想。如果说一九三〇年以前，张东荪的生活是漂泊不定的（很少在一个固定的“单位”工作超过二年，《时事新报》除外），思想正在植种、吸收营养，正在孕育，那么在一九三〇年以后，张东荪的生活就进入“超级稳定期”（从此再没有离开燕京大学及其后继者北京大学），思想亦随之进入发芽、长叶、开花、结果的成熟期。就

^①《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页990—991，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版。

张东荪个人而言，一九三〇年是一条最为显眼的分水岭，无论是生活还是思想，此前是一个样子，此后则是另一个样子。

二、对学术界一个公认观点的辨正

贺麟的《当代中国哲学》一书，在论及“西洋哲学的绍述与融会”时，曾列举了好几个“自从”，如“自从”民国十二年张颐（真如）回国主持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才开始有够得上近代大学标准的哲学系；“自从”张东荪、瞿菊农、黄子通等民国十六年创刊《哲学评论》，中国才开始有专门性质的哲学刊物；“自从”民国二十四年四月中国哲学会成立并举行第一届年会，中国才开始有自抒哲学理论、自创哲学系统的尝试；等等。最后谈到有关西洋哲学输入中国的一个“自从”：“自从民国三十年中国哲学会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成立后，我们对于西洋哲学，才有严格认真，有系统的有计划的经过专家校阅够得上学术水准的译述和介绍。”^①此处明确把“够得上学术水准”、“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输入西洋哲学的时间，界定在“民国三十年”即1941年之后；我们以为这个界定是有问题的。

贺在书中感叹西洋哲学之传播到中国“实在太晚”，使得中国的学术文化“实在吃亏不小”，并分析原因，认为这是由于中国哲学界“缺乏先知先觉之士及早认识西洋哲学的真面目，批评地介绍到中国来”^②。此言诚有相当道理！但早在“五四”运动前后张东荪就明确打出“费先生”（Philosophy）的旗帜，以纠“赛先生”与“德先生”之偏，算不算“及早认识”呢？在一九三〇年以前张东荪就已全面而系统地向中国输入了几乎全部西洋哲学，算不算“批评地介绍”呢？中国哲学界不是没有懂得西洋哲学之真正价值的“先知先觉之士”，只是这“先知先觉之士”人数太少，声音太弱，在“赛先生”在“德先生”的滔天巨浪中，他们就是呐喊至死，也没有几个人能听得见。

^① 贺麟《当代中国哲学》页27。

^② 同上书，页26。

贺又感叹中国人缺乏领略发掘“西人精神深处的宝藏”的能力，真是一针见血。他以为中国人接近西洋文化，一直就是从“外表”、“边缘”、“实用”方面进行的，缺乏“直捣黄龙”的气魄，同样是一语中的。问题是“黄龙”何在？很多人认为西洋的科学技术就是“黄龙”，又有很多人以为西洋的民主自由就是“黄龙”。贺不然，贺以为只有西洋的哲学才是“黄龙”，而且只有西洋的古典理性主义哲学才是“黄龙”。所以他对输入西人的“船坚炮利”不以为然，对输入西人的“高度有组织的政治法律”不以为然，对输入西人的“高深的学术思想”及从“外表”、“边缘”、“实用”方面输入“西洋哲学思想”，还是不以为然。如何算是从“外表”、“边缘”、“实用”方面输入西洋哲学呢？贺回答说，只输入功利主义、实证主义、实验主义、生机主义、尼采的超人主义、马克思的辩证法唯物论、英美新实在论、维也纳学派等等“五花八门”的哲学，而不输入“代表西洋哲学最高潮，须要高度的精神努力才可以把握住的哲学，从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从康德到黑格尔两时期的哲学”^①，就算是“从‘外表’、‘边缘’、‘实用’方面输入西洋哲学，就算是缺乏‘直捣黄龙’的气魄”。所以贺心目中的“黄龙”，不仅不是科技，不仅不是政法，而且不是“现代的”西洋哲学；他只认“上古”与“近世”两个时期的哲学（“中古”与“现代”除外），是真正西洋文化的“黄龙”。

贺的分析鞭辟近里，只是这些话是说于1945年，时间上有点“太迟”。我们以为张东荪在西洋哲学输入史上，就是“直捣黄龙”的第一人。他1927年引介西洋理性主义（Rationalism）或“唯理派哲学”的长文《名相与条理——唯理派思想之来历及其分析》（1927.2.10—2.25），就是“直捣黄龙”的决定性的一击。难怪贺要称赞这篇长文是“民国十八年前后，谈西洋哲学最有价值的一篇文章”^②。张东荪“直捣黄龙”之举，不是发生在贺所界定的“民国三十年”之后，而是发生在我们所界定的“一九三〇年以前”，可知“严格认真，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够

^① 贺麟《当代中国哲学》页26。

^② 同上书，页30。

得上学术水准的”对于西洋哲学的译述与介绍，是完成于一九三〇年之前，而不是1941年之后。

如果把贺麟对于西洋哲学“严格认真，有系统的有计划的经过专家校阅够得上学术水准的译述和介绍”之说法，简称为“蓄谋输入”西洋哲学，则“蓄谋输入”的时间，除了贺麟“1941年之后”这种很明确的说法外，还有一种较含混的说法，叫做“30年代以后”。如2003年第4期《哲学研究》杂志，就登载了清华大学王晓朝谈“清华哲学翻译系列”的《文本、解读、诠释与翻译》一文，文中就有“20世纪30年代以后”之说法，认为：“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哲学家为适应新的思想启蒙的需要，希望引进西方哲学，用来振奋和激发中国人的爱国精神。”^①王此文倒没有明说“30年代以后”是“蓄谋输入”西洋哲学的开始。他说到“爱国精神”之类，恐怕确指的还是“九一八”之后“唯物辩证法”的输入情形。王看重“20世纪30年代以后”，却也不轻视“一九三〇年以前”这一时段，他提到这一时段中的李大钊、李石岑、张铭鼎、张东荪等人，认为他们对西洋思想的输入已经“为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和哲学界的诞生奠定了基础”^②。这样的评语当然是恰如其分的，不过没有分清主次，李石岑、张铭鼎等人在这一时段输入西洋哲学的成绩，是不能和张东荪相比的。

不管具体内容如何，王既已提到“30年代以后”一说，就已经是把“30年代”当成了一条界限，界限两端情形有不同。这是学界的一个基本思路：认为“一九三〇年以前”中国之输入西洋哲学是处于“杂乱的无选择的稗贩阶段”，既不是“有系统的源源本本的介绍”，更无法做到“由了解西洋哲学进而批评，融会并自创”^③。这几乎已成学术界一个公认的观点，我们对此需要辨正的是：第一，“一九三〇年以前”“直捣黄龙”之举已经存在，至少张东荪已有“西洋哲学为西洋文化之根”的明确意识；第二，“一九三〇年以前”“蓄谋输入”西洋哲学之事已经存在，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张东荪；第三，“一九三〇年以前”西洋哲

① 王晓朝《文本、解读、诠释与翻译》，《哲学研究》2003年第4期，页84。

② 同上书，页83。

③ 贺麟《当代中国哲学》页27。

学的输入，并不是“杂乱的无选择的稗贩”，而是“有系统的源原本本的介绍”，并已开始进入到“批评，融会并自创”的阶段，如张东荪；第四，“30年代以后”或“1941年以后”可以是一条界限，但却不能视为输入西洋哲学之质量高低的界限，认为此前的输入是低劣的，而此后的输入是高优的。这只是一条输入方式与输入方法的变更线，并没有实质的内容。

三、辨“中国研究或介绍西方哲学的知名学者”

《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有一栏目介绍“中国研究或介绍西方哲学的知名学者”，共七位，分别为：全增嘏、张颐、冯文潜、郑昕、严群、贺麟、洪谦。查全增嘏（1907—1984），浙江绍兴人，1927年获美国哈佛大学硕士学位。最早的输入西洋哲学的著作《西洋哲学小史》，出版于1932年。张颐（1887—1969），四川叙永人，1919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1年又获英国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30年代后”发表过分析黑格尔学说的六篇论文。冯文潜（1896—1963），河北涿县人，1920年获美国艾奥瓦州格林奈尔大学文学士学位，后又入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院、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学习。主要以讲课方式输入西洋哲学（最初回国任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讲师、副教授是在1928—1930年）。郑昕（1905—1974），安徽庐江人，留学德国柏林大学（1927）及耶拿大学（1929），1932年回国。输入西洋哲学的《真理与实在》刊于1936年，《康德学述》刊于1946年。严群（1907—1985），福建闽侯人，1935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38年留学耶鲁大学，1939年回国。贺麟（1902—1992），四川金堂人，1926—1930年留学美国，曾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30—1931年留学德国柏林大学，1931年回国。最早的输入西洋哲学的著作《德国三大哲人处国难时之态度》出版于1934年。洪谦（1909—1992），安徽歙县人，曾留学德国柏林大学、耶拿大学及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并于1934年获维也纳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最早的输

入西洋哲学的著作《维也纳学派哲学》，出版于1945年。

以上七人有几个共同点：第一，均有留学欧美的经历；第二，发表引介西洋哲学的文字（或讲课）均是在“一九三〇年以后”。可知《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所列举的“中国研究或介绍西方哲学的知名学者”，虽然贡献不小，成就不小，但却均处于“一九三〇年以后”这个时段。

那么在“一九三〇年以前”这个时段“中国研究或介绍西方哲学的知名学者”又有谁呢？王晓朝列举了李大钊、李石岑、张铭鼎、张东荪等人，诚然是不错的，但却漏掉了严复、王国维、梁启超等几位重量级的人物，还漏掉了刘伯明、缪凤林等几位次重量级的人物。这些人中输入西洋哲学成绩最好的是谁呢？或许各人有不同看法，但我们以为张东荪无疑是首选。

换言之，像《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那样，一般地谈“中国研究或介绍西方哲学人知名学者”，是很难的；分段以后稍微容易些。我们不谈“一九三〇年以后”的情形。就“一九三〇年以前”而言，张东荪无疑是“中国研究或介绍西方哲学的知名学者”。

四、何以能说张东荪“成绩最好”

“一九三〇年以前”输入西洋哲学的人，不可谓不多，但都不及张东荪有成绩。这是我们提出的一个看法，这个看法有没有什么依据呢？能有什么办法证明这个观点吗？

要证明这个观点，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采用“排除法”，一个一个地排除就行了。

1923年12月，蔡元培刊行了一篇长文，名曰《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分“西洋哲学的介绍”与“古代哲学的整理”两方面，谈那一时期中国人与哲学的关系。“西洋哲学的介绍”方面，蔡论及的第一个人，就是侯官严复，认为严氏介绍西洋哲学的“旨趣”，“虽然不很彻底，但是他每译一书，必有一番用意”，并说他“译得很慎重，常常加入纠正的

或证明的案语。都是很难得的”^①。

1935年11月，郭湛波刊行《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在“中国五十年来思想的介绍”一篇论及的第一个人，也是严复。认为虽说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就已经开始介绍西洋学术思想，但“介绍西洋思想最早，影响最大，要算严几道氏”^②。认为严氏既介绍了赫胥黎（T.H.Huxley，1825—1895）的学说，又介绍了达尔文（C.R.Darwin，1809—1882）的学说，还介绍了斯宾塞（H.Spencer，1820—1903）的学说，这些思想输入中国，“影响中国思想界甚大，进化论的思想，风行一时”^③。

1945年5月，贺麟刊行《当代中国哲学》，其“西洋哲学的绍述与融会”一章论及的第一人，同样也是严复，认为在介绍西洋哲学方面，“大家都公认严几道是留学生中与中国思想界发生关系的第一人”^④。在陈述了这个公认的观点以后，贺对严复的介绍西洋哲学作了一个分析，结论是“严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⑤。这个结论，正就是我们排除严复的理由。

从“纯哲学的立场”说，贺以为第一，严氏没有译述比较专门的哲学著作；第二，严氏译介的目的是实用的而不是纯学术的；第三，严氏虽提出过“信”、“达”、“雅”三大翻译标准，但着重点在“雅”而不在“信”与“达”。关于第二点贺分析说，严氏介绍进化论以弱肉强食、物竞天择等观念警惕国人，介绍英国功利主义以努力富强之术策勉国人，前者忽略了进化论之生物学研究及其发生方法，后者忽略了功利主义之提倡放任、容忍、自由平等之民主思想及其注重社会福利、改善平民实际生活之社会改革思想。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说明严氏的译述是实用主义的，“不是纯学术的”，他译述的学说“不是他服膺有心得的真理，而只是救时的药剂”。关于第三点贺分析说，严氏译《天演论》，原文一字他粉饰成两三句，原文一两句他铺张成一大段，如此虽可写成“相当美的古文”，但哪里还谈得上

① 蔡元培《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蔡元培选集》页218，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5月第1版。

②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页347。

③ 同上书，页357。

④ 贺麟《当代中国哲学》页27。

⑤ 同上书，页28。

“信”，谈得上“达”？故贺麟总结说：“所以我们认为他的译述，就内容言，非专门哲学的；就目的言，是实用的；就方法言，是用文雅的古文以达目的。他有他所以要如此作的苦衷，他曾尽了他对时代的使命。然而现在我们不能不说严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①

贺提出的理由，已经足够把严复排除出“一九三〇年以前输入西洋哲学成绩最好者”之名单。

蔡元培《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在“西洋哲学的介绍”方面论及的第二个人，是高阳李煜瀛，认为他发起从法国方面输进来一种同样是根据进化论，但却是纠正强权论的学说。查李煜瀛即李石曾（1881—1973），河北高阳人，1902年起留学法国巴黎大学，1911年夏归国，期间曾在法国创办《新世纪》周刊（1906），醉心于无政府主义之宣传。回国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1917）。卒于台湾，著有《石僧笔记》。蔡说李氏是由农学转而研究生物学，由生物学转而研究拉马尔克之动物哲学，又由动物哲学转而研究克鲁泡特金之互助论，并为之介绍、宣传。同时还介绍一点卢梭、伏尔泰等人反强权、反宗教的哲学以及纪约的自由道德论等。蔡认为“李氏译了拉马尔克与克鲁巴金的著作，在‘新世纪’发表。虽然没有译完，但是影响很大”^②。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在“中国五十年来思想的介绍”方面论及的第二个人，同样是李石曾，并认为李氏以克鲁泡特金（P.A. Kropotkin, 1842—1921）之“互助论”纠正“强权论”，其介绍跟周佛海所译《互助论》（Mutual aid）一样，“对于中国近代思想都有大的影响”^③。

如此则李石曾是否可列入“一九三〇年以前输入西洋哲学成绩最好者”之名单呢？我们以为不能。理由是：（一）李氏仅输入“互助论”，太褊狭；（二）“互助论”并非西洋哲学之核心思想，不足以反映西洋哲学之根本；（三）李氏之活动及影响主要是在国外，国内哲学界几乎未受其影响。目前坊间的几部“中国现代哲学史”，很少有提及李氏的。故我们把他排除在外。

① 贺麟《当代中国哲学》页28。

② 蔡元培《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蔡元培选集》页218。

③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页360。

贺麟《当代中国哲学》之“西洋哲学的绍述与融会”章论及的第二个人物，是梁启超。梁撰有《西儒学案》（1901—1903），引介霍布斯、笛卡尔、洛克、康德等大哲的思想，自然对输入西洋哲学有贡献。不过贺说他“更不甚懂得”康德，其引介尚带有“稗贩，破碎，笼统，肤浅，错误诸弊”^①。我们以为梁输入西洋哲学的确不全，也不深，更没有必得输入西洋哲学的明确自觉，故宜排除在外。

蔡元培《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在“西洋哲学的介绍”方面论及的第三个人物，是海宁王国维，认为他对叔本华哲学及尼采的学说有透彻的研究，介绍也很扼要，“他对于哲学的观察，也不是同时人所能及的”^②。但蔡有一个遗憾，就是王国维不久就自觉而坚决地放弃了哲学：“王氏那时候热心哲学到这个地步。但是他不久就转到古物学、美术史的研究；在自序中所说‘研究汗德’的结果，嗣后竟没有报告也没有发表关于哲学的文辞了。”^③这是一个中途的退场者，哲学上一个半途而废的人，哪能言“成绩最好”？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之“中国五十年来思想的介绍”部分所论及的第三个人物，也是王国维，认为他是“介绍德国思想到中国来，最早，而影响最大的”^④人；认为他对叔本华（A.Schopenhauer, 1788—1860）学说的介绍“颇为扼要透辟”，又介绍尼采（F.W.Nietzsche, 1844—1900）思想，只是“不及叔本华的详备”；并认为他“不久抛弃哲学，而转到考古学，美术学上去”^⑤。所有这些议论，均与蔡元培相同，故依然不能成为肯定王国维输入西洋哲学之“成绩最好”的证据。

贺麟《当代中国哲学》之“西洋哲学的绍述与融会”章论及的第三个人物，同样亦是王国维。认为王不仅曾抱有“接受欧人深邃伟大之思想”的雄心，而且具备当此大任的“学力和才智”；认为他对叔本华哲学的确“有了直接亲切的了解”，且能以此批评《红楼梦》，更能由叔本华而“下至尼采，上通康德”。但贺同样承认其“逃兵”行为的存在，说他直作了

① 贺麟《当代中国哲学》页 28。

② 蔡元培《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蔡元培选集》页 223—224。

③ 同上书，页 225。

④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页 360。

⑤ 同上书，页 360—367。

一首赞咏康德的诗之后，“便永远与哲学告别了”。贺以为这不能全怪“他缺乏哲学的根器”，而应怪当时中国的思想界“尚没有成熟到可以接受康德的学说”^①。

蔡元培、郭湛波、贺麟诸人，都肯定王国维输入德国思想的贡献与劳绩，但同样都肯定他是哲学上自觉的“半途而废者”，再加上他输入的西洋哲学仅限于德国，根本无法反映西洋哲学之全貌，故我们以为无法许之以“成绩最好”。

蔡元培《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在“西洋哲学的介绍”方面论及的第四组人物，是张东荪与张君勱，认为他们是“专门研究”并介绍柏格森哲学的。蔡提到张东荪“已经译了”的柏格森的《创化论》（L'evolution Creatrice）以及“现在又译”且“不久可译完”的《物质与记忆》（Matière et Mémoire），没有提到张东荪当时（1923年12月以前）已经发表的输入西洋哲学的其他作品。蔡论及的第五个人物是胡适，认为他可算是介绍“杜威学说上最有力的人”^②，并附带提及蒋梦麟、刘伯明、陶知行等人。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之“中国五十年来思想的介绍”部分论及的第四个人物，是胡适，附带蒋梦麟、刘伯明、陶知行等人。郭认为“胡氏是介绍杜氏思想最有力的人，他的治学及著述的方法，都是杜氏的方法”^③。又认为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的思想“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影响甚大”^④。

贺麟《当代中国哲学》之“西洋哲学的绍述与融会”一章论及的第四个人物，也是胡适，不过说得极简略。认为在王国维发表有关叔本华的文字（1905）之后十余年间，中国人对于西洋哲学的研究与译述“异常消沉”，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才有胡适之等人“介绍了一些詹姆士杜威的实用主义和科学方法”^⑤。

① 贺麟《当代中国哲学》页29。

② 蔡元培《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蔡元培选集》页229。

③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页369。

④ 同上书，页373。

⑤ 贺麟《当代中国哲学》页29。